

## 波兰高等教育的十年改革 (2010 ~ 2020)

马瑞克·克维克

马瑞克·克维克 (Marek Kwiek): 高等教育教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机构研究和高等教育政策主席、波兰波兹南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Poznan) 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电子邮箱: kwiekm@amu.edu.pl

在 1989 年后的 20 年里, 波兰的大学基本上没有进行过改革。这一系统在这一时期的核心特征直到 2010 年代初几乎都没有改变, 如非竞争性的研究资助模式、强势的学院管理和无效的治理, 以及复杂的多级学位和职位体系。

科研经费不足, 研究任务被低估。高等教育扩张和与教学相关的私有化 (服务于大量的自费兼职学生) 是主要的政策方向。然而, 从 2000 年代中期开始, 政策制定者和机构领导人开始清楚地认识到人口下降的长期影响。事实上, 在 2006 年, 大约有 200 万名在校学生, 到 2020 年, 这一数字已经下降到 120 万。因此, 到 21 世纪后期, 科研就成为了一个新的国家政策重点。

### 十年改革

2010 年代是改革的十年, 几乎改变了大学运作的方方面面。科研作为一项主要的大学使命被重新制度化, 并引入了一个新的以拨款为基础的研究资助系统。波兰大学的科研任务从私有化转向非私有化, 从非制度化转向再制度化。

随着科研重新成为国家政策重点, 科研经费由一个新的国家研究委员会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成立于 2010 年) 进行竞争性分配。研究的公共补贴与教师表现和国家评估挂钩。科研国际化成为这十年所有主要政策文件的关键词。

新的资助和评估机制推动了系统的垂直分层, 并逐渐出现了两类机构: 一种是研究导向强烈的机构, 另一种是研究产出和资助有限的机构。此外, 新的卓越计划“研究型大学计划”(IDUB 2020 ~ 2026 国家计划) 于 2020 年启动, 旨在通过竞争为 10 所大规模大学提供额外资金。“研究型大学计划”的总资金约为 10 亿美元, 为期 7 年, 其支出可根据特殊机构发展计划和修订后的机构战略酌情决定。

然而, 迄今为止, 波兰科研国际化的激励机制被证明是无效的。这种新的、竞争性分配研究经费的方式并没有如预期的那样对波兰科学产出的结构产生积极的变化。由于国际合作而出版的产出份额在欧洲是最低的, 尽管国际索引出版物的数量大幅增加。波兰未能充分利用欧盟的研究资金, 特别是欧洲研究理事会的资金。学术研究的低支出导致了国际化政策的失败: 科研资金管理 (新的拨款制度) 的急剧变化并没有伴随着学术科学融资水平的根本变化。此外, 2014 年和 2017 年的学术推广体系和研究评估原则 (称为“参数化” [parameterization]) 对科研国际化的推动力度不够。

### 第一波改革

在 21 世纪 10 年代有两次改革浪潮。第一波是 2009 ~ 2011 年由芭芭拉·库德里卡 (Kudrycka) 部长发起的 (又称为库德里卡

改革), 第二波是 2016~2018 年由雅罗斯瓦夫·戈文 (Jarosław Gowin) 部长发起的 (又称为戈文改革)。在库德里卡改革的框架下, 波兰的体制在多级治理的基础上进行了重新配置, 在高等教育机构和国家之间建立了新的中介协调机构, 国家网络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学术研究的资助直接与可衡量的研究生生产力的评估相挂钩, 目标是发展大约 1 000 个基础学术单位, 其中大部分是学院。

在库德里卡改革之前, 国家直接参与协调高等教育。在新的治理架构中, 机构和学术机构的更高正式自治与更高级别的问责相结合。这些机构或由学术界选出的学者直接管理, 或受到理事会间接影响, 因此原则上独立于国家。国家继续定义全球公共资助水平、国家研究的优先领域, 以及主要资助机构之间的主要资金分配。然而, 如何分配研究经费是由这些机构内的学者决定的。

## 第二波改革

戈文改革 (始于 2016~2018 年, 但推迟到 2022 年实施) 背后的基本理念是为了进一步区分高等教育体系, 并使波兰学术知识生产国际化。讨论的两个主要概念是系统分化 (教学导向机构与研究导向机构) 和科研国际化 (国内研究与国际研究)。

虽然教学在戈文改革中很重要, 但主要的重点是沿着教学和科研的路线区分系统, 以及科研国际化。高等教育体系统近来的主要变化集中在科研方面: 根据新定义的研究学科列表, 在大学中形成新的机构结构; 发展新的研究评估体系 (预计将于 2022 年启动); 在“研究型大学计划”框架下获得额外

资助的 10 所研究密集型大学; 在有明显科研成果的大学里建立新的博士学校, 而不是分散在整个系统里。另一个重要的变化是加强校长和他们的管理团队——以牺牲传统的代表机构, 如参议院和教师委员会为代价。

这一科研国际化议程意味着在资助和评估体系中引入大量定量的、以研究为重点的指标: 人们期待看到更多的国际合作、更多的国际可见 (通过全球数据集) 的研究, 以及更多的国际合作出版物, 无论是在个人、机构还是国家层面。

## 大学和大政方针

在 2010 年代, 大学没有被政治化, 在两波改革浪潮中, 大学受到了国家重大政治变动的保护。特别是, 2015 年从中立政党到右翼政党的政权交替, 并没有改变高等教育政策。大学改革和大学本身没有经历过去几年那种带有强烈民粹主义色彩的毁灭性政治冲突。没有发生以政治为动机的高等教育变革; 然而, 在过去的几个月里, 高等教育, 特别是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重新国有化”主题, 与其正在推进的“国际化”相反, 在政治圈被讨论。国家政治会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未来高等教育研究国际化、制度纵向分层和资助模式竞争性的总体政策方向, 这是很难预测的。然而, 从 2009~2015 年 (中间派政府) 和 2015~2020 年 (右翼政府) 这两个时期的经验来看, 尽管表面上存在一些动荡, 但在体制层面继续改革的前景似乎相对良好。希望改革将得到加强和巩固, 而不是停止或逆转, 以确保大学不会被推向新的或是民粹主义的方向。